

白居易研究的反思与批判

肖伟韬 著

要想真正理解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深足迹的、并具有伟大人格的思想者和存在者白居易，就必须弄清楚居易自己是怎样审视和查问其自身之生存状况的，只有通过其自身对时代、对社会、对历史以及对自我心态、思想、信仰等属性的充分表述，并把这些表述加以归纳与总结，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历史原生态中的白居易。



BAIJUYI YANJIU DE
FANSI YU PIPAN

白居易研究的反思与批判

◎ 肖伟韬 著
XIAO WEITAO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白居易研究的反思与批判 / 肖伟韬著. —兰州: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80588-642-8

I . 白… II . 肖… III. ①白居易 (772~846) —文学研究 ②白居易 (772~846) —人物研究 IV. I206. 2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3237 号

白居易研究的反思与批判

肖伟韬 著

责任编辑: 杨继军 马吉庆

装帧设计: 马吉庆

出版发行: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邮 编: 730030
电 话: 0931-8773148(编辑部)
0931-8773269(发行部)
E - mail: gsart@126.com
网 址: <http://www.gansuart.com>

印 刷: 兰州瑞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70 千
插 页: 4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书 号: ISBN 978-7-80588-642-8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可随时与本社发行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一盞孤燈鋪水木，
一盞孤燈鋪水木，

半江瑟瑟半江紅。
半江瑟瑟半江紅。

前　　言

之所以把这部论著命名为《白居易研究的反思与批判》，是因为我在阅读、理解和研究白居易、白居易诗文以及白居易研究的相关典籍、论著时，心中积郁了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来不及深究，有些问题则作了一些思考和探讨，而且，在相应问题的思考与探讨中，语气还颇为尖锐刻峭，因此也就顾不上将要面对的所谓非议，径直取了个有点哗众取宠的书名。

谓其哗众取宠，其是也不是，是者，已如上言；不是者，那是因为相信自己对白居易研究中现存的一些问题的确还是有所认识，单就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及著作而言，如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开创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范型，但许多论点则成了后来学者加以重新检讨的标的；岑仲勉《岑仲勉史学论文集》、《续集》及其他专著的相关论文，对白氏诗文校勘、辨伪及生平考索功力独到，却缺少相应的理论阐发；朱金城以《白居易集笺校》、《白居易年谱》、《白居易研究》等，奠定了其白居易研究的大家地位，但在对白氏诗文进行笺证时，大凡涉及宗教方面的内容，则基本上付之阙如；顾学颉《顾学颉文学论集》关于白氏的相关论文，也大体拘囿于传统的治学门径，大多问题论述的深度和广度均为有限；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既有对《白居易集》版本源流的研究及作品的考证，又有对其生平、思想等方面比较详尽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表现了一定的总结性，但

对白居易作为一个伟大人格以及整个生存哲学的把握与论述则显然不够，而且，某些观点也有进一步细化甚至是纠偏的必要；蹇长春《白居易评传》，虽然论述详尽，有些定位也颇为精到，但受评传这一体裁的限制，平面胪列过多，发掘的也不够深入；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侧重资料搜集整理，为白居易在后世的影响提供了众多线索，但基本上是工具性的类书……

同时，对白居易相关的大量针锋相对的观点，那就更有进一步加以反思的必要，如诗史定位：有的人认为白居易可与李、杜相提并论，誉之为“华岳干天”，有的人却认为是“桑间濮上之音”，不值一提，甚者“欲以法治之”。相应的，就是诗学思想：白居易的诗学思想，到底是单一静态的还是多元动态的，引发了不少的笔墨官司；对白氏新乐府的评价，有人认为“乃一部唐代诗经”、“宇宙间必不可少之文字”，有人却认为不过是“单纯的传声筒”、“另一种形式的谏书而已”。又如，宗教信仰：白氏早年的禅宗信仰，学者对以《八渐偈》为基点的白氏早年禅宗信仰的探究，究竟为南宗禅法还是北宗禅法，却得出了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的看法；而对其整个宗教思想的界定，到底是道家或道教占主导地位，还是佛、禅占主导地位，也争执已久；即便单看道家，到底是老子对白氏影响深刻还是庄子影响深刻，也值得进一步深究；又则，白居易的神仙信仰，到底是“体道的目标”，还是“姑妄从之”，也有弄清的必要。再如，思想及思想转型：如何界定和厘清白氏的“中人”与“中隐”观，如何明确白氏的身份界定，到底是“儒者”、“文儒”还是“文士”，如何看待白氏的思想转型，其从一般文学史教材到相应专论，不断为人津津乐道，转折点也从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到元和五年卸任左拾遗，再到长庆年间外出杭州等不一而足。又则，白居易与他“爱等弟兄”的金兰之交元稹，他们的文学成就、文学史上的地位、从政品质、道德人格以及友谊误会等，也是后世学者关注的焦点；与之同时，杜牧对元、白的攻讦也是元、白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尤其是杜牧攻讦元、白的原因，学术界有持不同诗学主张说者，有为好友张祜鸣不平说者，也有因

元、白与杜牧祖父杜佑结怨说者，迄今没有形成定论……

除了以上诸多异常尖锐的问题值得辩驳澄清外，白居易与科举之间的关系，白居易姓名字号的文化心理意蕴，宗教信仰的心理基础，对“才”、“时”、“名”、“位”与“命”之省察，以及白居易“情在我辈”，道教与佛、禅信仰的动态考察等等，所有这一切，均值得深刻地分析与反思。

鉴乎此，我有一种强烈的心理诉求，由此也就形成了撰写此著的最初机缘和根本动力，抑制不住冲动地想做一回“野人献芹”，“献芹”的内容，正文是具体的展现，作为前言，只能把几个与本书相关的问题，也是我近些年与古代文学尤其是与白居易结缘以来，一直萦绕在脑海中的一些肤浅的想法和思考摆弄出来，希望大家能够给我提出诚恳的建议与严正的批评。

首先，这部书稿研究方法的使用，“以白注白”是我遵循的一条基本的原则，把它作为一条基本的原则，我作了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要想真正理解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深足迹的、并具有伟大人格的思想者和存在者白居易，就必须弄清楚居易自己是怎样审视和查问其自身之生存状况的，只有通过其自身对时代、对社会、对历史以及对自我心态、思想、信仰等的充分表述，并把这些表述加以归纳与总结，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历史原生态中的白居易；二是因为，许多白居易的研究者甚至包括某些知名专家，在研究过程中或则出现某些不该出现的常识错误，或则随意生发的成分较多，所以这一方法的运用也就有了纠偏的些许用意，书中诸多篇目便是这一方法的具体操作。当然，这种方法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原因很简单，人毕竟是历史中的人，个体再怎么伟大，也不可能超越历史而全知全能，更不可能跨越社会形态超前思考问题，所以不能苛求主体完全以书面的形式展现自我，白居易也不例外。因此，我在坚持“以白注白”这种内部求证法的同时，还适当结合了外部求证法，即对当时的历史、宗教、学术、社会思潮以及时人、后人的相关评价、研究等作了相应的考察与比照，以便对白居易研究中的某些偏颇或不当的论点进行有理有据的辩驳。

其二，体例上，我有意综合了评传与笺证的体例。众所周知，这两种体例各有优缺点，就评传言，它能充分展现一位作家的生平、思想、行迹以及各方面的成就，但由于面面俱到，大多时候论述问题并不是特别深刻；就笺证言，它可以以一事、一诗、一文乃至一字而论，挖掘得越深、求证得越全，越能见出学者的功力，但对于作家的整体把握来说，无疑又有与生俱来的缺陷。因此，我采用一事一议的方法，又观照整体布局的需要，将二者进行了糅合，至于其结果如何，则不是我个人的愿望所能决定的。

其三，结构上，从书目来看，它是由十九个单篇论文综合而成，所以没有像一般意义上的学术专著那样，能够构成一个首尾连贯的严密的逻辑体系，这一点，我特别借鉴了《儒林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箭垛式行文结构，用“一线贯珠”的方式，集中阐发了自己对白居易十九个侧面的一些看法，这种做法，也就是《孽海花》的作者曾朴对《儒林外史》这部由短篇蝉联而成的长篇所作的譬喻那样：“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练。”不过，值得说明的是，吴敬梓是用诸多的艺术形象的刻画以及诸多线索的先后推进，揭露批判了当时科举制度的深重罪恶，我则是用白居易丰富多彩的人性构成来全面凸显其复杂伟大的人格。当然，这样做，我也一直有所担心和犹豫，这便是能否把小说的结构移植到学术著作中来？不过幸好，我的这种组织剪裁的方法，在王运熙那里也找到了相应的理论支持，他说：“我一直以为，论著的质量，关键不在于有系统性和数量庞大，而在于是否实事求是地提出精辟的创见，对问题的研究较过去有所推进。”对白居易的研究甚或包括研究的研究，我是否提出了“精辟的创见”、以及是否“较过去有所推进”，我不敢王婆卖瓜，相信读者自己的心明如悬镜。

其四，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大都是“灯下窗前常自足”的人，作为古代文学这一领域的跋涉者，更是沉浸于那种“古人与我话衷曲”的自我陶醉中难以自拔。不过，有一点应该明白的是，任何

学术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结合当代意识的参与，才能找到其相应的意义和持久的生命力。因此，在我进行古典文化文学研究时，我也明确要求自己的研究要结合当代意识加以展开，这一点，程千帆的看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研究古代文化文学，是为了现在活着的人，不想到这一点，我们的研究便没有意义。”这种“关注当代”和“为了当代”的“当代意识”，既是我着力所遵循的一条原则，也是我极力想达到的一种境界。因此，在对白居易这一历史名人进行研究和文化反思时，除了一些相关问题的考论与辨析之外，我更多的是对其人格的重组与建构，试图用一种符合当代人理解习惯的方式，来进行解读和诠释。当然，这也许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也许是一种心态上的宽慰，但想到实际与理想的距离，我的心也就冰释了。

行文到此，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似乎不像前言，但木已成舟，也就顺遂自然好了。

目 录

CONTENT

第一章 时有沉冥子

- 白居易姓名字号的文化心理意蕴 /3
白居易宗教信仰的心理基础 /14
白居易对《诗经》的推尊及其诗学思想多元倾向的重新检讨 /29
试论《周易》对白居易的影响 /35
《老子》、《庄子》对白居易思想的影响及其定位 /45

第二章 默语不妨禅

- 白居易神仙信仰的程度问题——兼与孙昌武先生商榷 /61
白居易从法凝所学为南宗禅法考论 /73
试从儒家心路历程看白居易的思想转型 /86
白居易道教信仰的曲折之途与信仰危机的超越之路 /103
白居易人生历程中佛、禅信仰三层境界的文本解读 /114

第三章 日久心弥守

- 白居易“中人”与“中隐”观厘析 /131
白居易“情在我辈”解读 /144
白居易的身份界定：“儒者”、“文儒”抑或“文士” /161
白居易对“才”、“时”、“名”、“位”与“命”之关系的省察 /179
白居易“世间”、“超世间”及“出世间”的不即不离 /192

第四章 是非都付梦

- 元、白论析 /209
杜牧攻讦元、白之原因铨衡 /236
白诗柳词的可比性及其内在成因 /252
试论洪迈《容斋随笔》对白居易之研究 /263

参考文献 /291

- 后记 /302

第一章

时有沉冥子……

十一
卷之三

白居易姓名字号的文化心理意蕴

宋代晁迥于《法藏碎金录》中，对白居易的名与字作了一个简要考察，他说：“白公名居易，盖取《礼记·中庸》篇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字乐天，又取《周易·系辞》云：‘乐天知命故不忧。’吾观公之事迹，可谓名行相符矣。”这里，晁迥不仅指出了白居易名与字的出处，而且从姓名文化的角度阐发了名字对白居易人生与创作的影响。是的，作为一名主体意识特别强的封建士子，受当时社会思潮、门阀制度以及姓名文化的影响，白居易对自己的生存心理和生存状态有着充分地关注和思考，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他对自己姓名字号有着深刻独特的体验与感悟。很有趣的一个事例是，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白居易为府试官时，在考核应举士子的《进士策问五道》的第一道策问便是这样的：

问：《礼记》曰：“事君有犯则无隐。”又曰：“为人臣者不显谏。”然则不显谏者，有隐也；无乃失事君之道乎？无隐者，显谏也。无乃失为臣之节乎？《语》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易》曰：“乐天知命，故不忧。”又《语》曰：“君子忧道不忧贫。”斯又忧道者，非知命乎？乐天不忧者，非君子乎？夫圣人立言，皆有伦理；虽前后上下，若贯珠然。今离之则可以旁行，合之则不能同贯。岂精义有二耶？抑学者未达其微旨耶？（卷第四十七）

从这道策问中可以看出，虽然题目问的是君臣大义、君子知命忧道的内在矛盾，但很明显，这无疑有意无意地掺杂了白居易个人的情感因素，甚至想通过士子们的理解和解答，来给自己“乐天”与“忧道”这一现实人生中深刻的矛盾和困惑提供一个参照的坐标。

与其不久的永贞元年（805），白居易作了《永崇里观居》一诗，在对自己名字的体验和关注的同时，对自己生存方式的选择便表现出了明显的自觉：“寡欲虽少病，乐天心不忧。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卷第五）其后，由于江州之贬的反面刺激，他的这种生存抉择在其人生历程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定型，如作于江州贬所的《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云：“时有沉冥子，姓白字乐天。平生无所好，见此心依然。如获终老地，忽乎不知迁。”（卷第七）同年的《自诲》也云：“乐天乐天，来与汝言……而今而后，汝宜饥而食，渴而饮，昼而兴，夜而寝。无浪喜，无妄忧；病则卧，死则休。此中是汝家，此中是汝乡。汝何舍此而去，自取其遑遑？遑遑兮欲安往哉？乐天乐天归去来！”（卷第三十九）

直到晚年，白居易仍然没有放弃对自己名字的反思与省察，如作于大和八年（834）的《少年问》，就明确宣称：“号作乐天应不错，忧愁时少乐时多。”（卷第三十二）开成四年（839），白居易在《病中诗十五首》其二中，又一次表明了自己奉行“乐天”哲学的心志：“若问乐天忧病否？乐天知命了无忧。”（卷第三十五）而作于武宗会昌元年（841）的《达哉乐天行》，则更是对自己晚年奉行的乐天哲学作了形象描述，其云：“达哉达哉白乐天！分司东都十三年。七旬才满贯已挂，半禄未及车先悬。或伴游客春行乐，或随山僧夜坐禅。二年忘却问家事，门庭多草厨少烟……死生无可无不可，达哉达哉白乐天！”（卷第三十六）另外，《醉吟先生墓志铭》虽被考证为伪作^①，但是铭文“乐天乐天，生天地中，七十有五年。其生也浮然，其死也委蜕然，来何因？去何缘？吾性不动，吾形屡迁。已焉已焉！吾安往而不可？又何足厌恶乎其间？”（卷第七十一）既很能表达白居易的“乐天”心态，又很能体现白居易的“乐天”形象，对白居易尤其是

其晚年知足保和、适性委顺、逍遙道场的思想，作了一个充分的阐释和表白。

众所周知，姓名文化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礼制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在传统的礼制文化中，姓是父系血缘的标志^②，它是所有氏族成员所共同拥有，许慎《说文解字》说：“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因生以为姓，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所以徐灏《说文解字笺注》说：“姓之本义谓生，故古作生，其后因生以赐姓，遂为姓氏耳。”关于这一点，傅斯年在《性命古训辨证》中作了细密的疏证后，总结云：“经典中‘姓’、‘性’二字，依上文所说，既知其本是一字，且识其本为一词也。经典中所谓姓者，表种族也，词指为血统。所谓性者，表稟赋者也，词指为质材。不相混也。……本书上篇释生性二字之关系曰，性，所生也。今益之曰，姓所由生也。后来‘姓’、‘性’二字，在古皆为生之一词之文法变化，……后来以此三字表三义，古则以此一词兼三事。后来以为血胤与稟赋非一事，古则以为本是一物之两面而已。”^③同时，氏只不过是姓的一个分支，为贵族阶级特有，在春秋宗族制度普遍形成之时，《左传》鲁隐公八年（前715）有这样的记载：“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之氏。诸侯以字为氏（氏旧误作谥，今依顾炎武校正），因以为号。官有世功，外有官族，邑亦如之。”因此宋郑樵《通志·序》说：“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最终姓氏合流。姓在古代社会的功能是明血缘，别婚姻，班固《白虎通义·姓名》有很好地表述：“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别婚姻也。”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尊尊、亲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政治基础之上，家国同构的基本政治结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统治，因此姓氏明血缘、别婚姻与贵贱这层社会功能，很长时期内被统治阶级作为强有力的统治工具加以宣扬，这就为中国古代尊礼重孝、崇祖祭祖、传宗接代^④以及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源和制度保证^⑤。

因此，姓氏受到重视，尤其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在门阀世族统治、

或者门阀世族势力非常强大的情况下，姓氏更是受到了近乎疯狂的膜拜^⑥。白居易出生在这样一种大的文化背景条件下，对自己祖先的追溯和推崇，“用谈说闻”（李商隐《白公墓碑铭》）的方式在历史上找出一位白氏最优秀的人物来充当自己的远祖，并移花接木、李代桃僵地认北齐望族白建为自己的近祖，我们也就理解而且应当理解了。因为作为一个生活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人，谁也不能完完全全地摆脱当时历史的束缚，谁也不能完全免俗。这正如俄国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所说：“人的社会化致使人贬为部分，致使人无法拓展深层上的个体和良心，无法掘出生命的源头。日益的社会化围剿着人的深面上的生存，鲸吞着人的精神生命。”^⑦况且，白居易本身就是一位具有强烈世俗伦理精神的封建士子，他从来就不想以圣人自居，也从来不让自己背上圣人道德的那副沉重的十字架，他是一位十分重视功利实效的政治理论家和实践者（这从他的《策林》七十五道、大量的讽喻诗创作以及担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时的制诰中可以明显看出）。所以，白居易对姓氏文化的膜拜，固然可以批判他俗气的一面，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这的确是十分平常的行为，可以为他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提供更好的心理基础。因此，白居易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秦将武安君（甚至更远），并与北齐白姓望族白建一系合宗，显然能够为白居易挤入上层统治，提供一块稳定的心理基石，并试图找到一个可靠的宗族保障^⑧。

与之相应，一个人的名、字、号，是其特定的称谓符号，是人们以语言文字作符号区别于个体的标志。但是，当这一特定的称谓符号与人所生存的社会发生关系时，便表现出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关于这一点，当代姓名学专家纳力碧力戈《姓名论》指出：专名系统具有比较稳定的意义结构，其中蕴含了特定群体和个人的生命价值、自然观念、信仰核心、亲族角色等等。并且认为：命名是文化复制的一部分，即命名按照一定的规则重复进行，具有传承性。对于婴幼儿的命名，表达的是成人尤其是命名者的期待，或具有某种特定的含义；在命名仪式的后面，是强大的习惯势力和体现为习惯法的社会规则^⑨。